

[美] 舒衡哲 著

中国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美] 舒衡哲 著

刘京建 译
丘为君 校订

中国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 (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8

ISBN 978-7-80225-309-4

I.中... II.①舒... ②刘... III.五四运动(1919)—研究

IV.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263 号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美)舒衡哲 / 著 刘京建 / 译

责任编辑: 耿红平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崑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2 字 数:30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309-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言

诚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齐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映海内外目前仍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当我于1969年开始进行这一研究时,“五四运动”早已是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学界论争的话题,从当时可资利用的材料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既可从政治性的爱国主义,也可从文学改革的意义上来探索。为了扩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我致力于研究“五四运动”在文化革命上的意义。我以为,中国的文化革命始自1910年代后期而于1966—1969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达到巅峰。

稍后,关于启蒙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它正是一个与当代历史激烈对话的结果。由于从一个新视野来考察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我开始对以前发生的事件的诸多意义提出了新的质疑。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我更明确地意识到,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是本世纪最错综复杂的悲剧之一。为了探寻这一悲剧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涵义,我必须彻底修正早先对1919年“五四运动”的看法。

我于1979—1980年间在北京大学进修,如此地亲近我研究了十年的主题所发生的时空,既觉有所启发,也感到惶恐不安。在我能获益于浩繁的新数据之前,我早先的某些观点必须抛却。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误以为191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49年的政治解放与1966—1969年间的文

化破坏运动。随着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我就更加意识到,“五四”遗产至今仍以各种方式提醒中国人中国尚未完全从过去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五四运动”中的参与者,亦或是其赞誉者,皆是“五四”遗产的具体化身。

最能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些棘手的论题的是那些硕果仅存的“五四”元老。我在中国进修的16个月中,以及1981年和1983年到中国访问的时候,有幸与八位1919年“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晤谈。许德珩、俞平伯、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这些人,正代表着一个从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到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之间的广义光谱。这群现代人眼中的儒家的知识分子,对我解释了他们年轻时反传统的动机。他们还讲述在历次批判知识分子运动中的辛酸经历,其中有些运动就是针对他们个人而发的。他们抛弃个人恩怨,详细叙述了以往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不断打乱他们的宁静思绪,并且迫使他们不断地改变自己作品的看法。在谈话过程中,他们不曾为自己辩护,只是从一己的立场讲述自身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这些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在为“五四”时代的热望作见证。他们仍旧深切地关注西方文化,并且受之启发,同时,还继续对中国的过去进行彻底的批判。“五四运动”形塑了他们之间互异的观点,但是,在其后60年的现在,他们却都坚信着,中国直至今日仍必须要去实现一个能真正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谐一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

在与这些“五四”老将们会谈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我们没有探讨到的话题,犹疑未决的难题,以及伴随着再次触及令人极其伤痛的生活片段而来的静默,对于那段确已发生过的历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我还和“五四”这一辈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们进行访谈,此举进一步地扩充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这批六十多岁的知识分子,目前正和一些较年轻的学者们着手研究发生在他们老师那一代的“五四运动”。他们不吝惜宝贵的时间及历史数据,坦诚地陈述自身在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辛酸经历,这使

我体会到：“五四运动”还未终结。

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1984年5月1日

于康涅狄格州 Middletown

目 录

序言	1
导言 中国启蒙运动的特殊性	1
第一章 1919年5月4日:新一代的产生	17
第二章 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世代合作与论争	65
第三章 “五四”启蒙运动	109
第四章 革命运动的严峻考验:1925—1927	169
第五章 迈向新启蒙,1928—1938	229
第六章 “五四”寓言	285
结论 启蒙运动的持续挑战	337
附录一 新潮社社员名单	361
附录二 新潮社领导人员	363
附录三 参加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新潮社和国民社 社员名单	365
参考文献	366

导言

中国启蒙运动的特殊性

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系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如果此一蒙昧不是缘于理解力的缺乏,而是缘于缺乏别人引导即无能运使其理解力的勇气,那么此一蒙昧就是自身造就的。Sapere aude! 敢于认知! 遵从自我的理解力! 这便是启蒙的格言。

康德:《何谓启蒙?》^[1]

[1] 见 H. B. Nisbet 翻译的《康德政论文集》(Kant's Political Writings)。该书由 Hans Reiss 编辑(London, 1970),我作了几处字句的改动。Reiss 的版本说明非常有助于了解康德为什么认为“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与“何谓真理”(What is Truth)的问题同等重要。参照 Reiss, p.192。

近代中国对康德提出的“何谓启蒙”的回答,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求。这是一个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以乡村为基地而展开革命的时代,也是寻求摆脱封建世界观的时代。那些将中国视为第三世界典范的人们,长期以来便认识到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变革的意义。而关切着现代化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紧张关系的社会理论家,至今也仍然是这么认为的。〔1〕这种紧张关系主要是显现在那些善于评论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著作中,其特质之一即是民族主义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冲突——从中国的角度看,就是因外侮而日感迫切的救国任务,与其内在需求的启蒙任务之间的冲突。这些致力于解决这种两难问题的知识分子,本身即是身受国内外近代教育的裨益者。他们和亿万同胞一样,希冀一个独立和强盛的中国,并为实现这一抱负积极地投身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

然而,启蒙运动倡导者们不同于纯粹的爱国革命家,他们拒绝将中国的落后——长期存在的“自身造就的蒙昧”——归咎于外来侵略者。哪怕是在欧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时刻,他们也拒绝为民族的过去歌功颂德。相反地,他们不断提醒人们中国封建传统所施加的重负,特别是宗法权威——即对家族或官僚国家盲目忠顺的伦理观。时至今日,长期持有这种伦理观的中国领袖和民众,仍将启蒙运动的挑战视为重大的爆炸性事件。

〔1〕 现代化与社会改革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看法是我在《长城怨:近代中国的启蒙问题》“A Curse on the Great Wall: The Problem of Enlightenment”一文中,首先处理的问题。见《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May 1984)。

在 18 世纪的欧洲,询问“何谓启蒙”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在质问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何谓真理”。〔1〕康德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概括了整整一代哲学家的思想。他将启蒙解释为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实现自我解放。这个答案构筑于长期的理性探索之上。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与此不同,他们不具备这种传统,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和回答康德的问题。他们对“何谓启蒙”及其衍生问题“何谓真理”的思索,要比那些欧洲的启蒙先驱者要实际得多。他们表达了一种急切的,几乎是萌芽状态的,要从自我奴役中解放的愿望。

中国启蒙运动倡导者对思想运动的迫切感,促使他们有别于欧洲的启蒙先驱。这种差异可以从 1919 年春天发表的新潮社成立宣言中略见一斑。当时,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为挽救时局,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根据康德的界说,来倡导启蒙。他们与 18 世纪的欧洲先哲不同:后者以为“敢知”是一己的权利,而新潮社的年轻倡导者,则只希望他们能够发掘自己的理解力。因此,他们的宣言听起来既像是对那位加里宁格勒(Königsberg)哲人缜密反思的刺耳却又天真的附和。

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不忍弃而弗论也。〔2〕

尽管这一论调失之轻率,但 20 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却代表着对其欧洲先哲的一种批判的诠释。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 18 世纪的欧洲先哲们的际遇不同。后者寻求从宗教的思想禁

〔1〕 Reiss:《康德政论文集》, pp. 192—193。

〔2〕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 1 卷第 1 期 (January 1919), p. 2。

锢中解放出来,而前者则是以抛弃(或者至少是揭露)“科举心态”、“盲从”(arbitrary credulity)以及摒弃习以为常的“为社会所拮制”的国民性为己任。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与根深蒂固的自我压抑习性战斗;这种习性乃是由家族权威而非由神权专制所支持。因此,就启蒙的内涵而言,也就中外有别。在康德的时代,启蒙是指一套“除魅”(disenchantment)的规划,即以由自然界所领悟的真理来取代那些宗教迷信。〔1〕但在20世纪中国,启蒙所追求的,则是一种持续不歇的“除魅”过程,要将中国从数个世纪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自身造就的蒙昧”源于腐败专制的教会势力所产生的教条主义。在近代中国,精神麻木的源头可追溯到儒家思想,或更确切地说,可追溯到那些包含“礼教”——一种对制度化顺服的崇拜——的儒家传统中的种种元素。〔2〕礼教思想通过科举制度而得以长存,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孝道伦理观适合于官僚帝国的需要。同样,这种由“三纲五常”所构成的“礼教”思想也早已深入民家。“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应持有的态度。这一切都要求后者心甘情愿地服从前者。尽管这些“纲”“常”都宣称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互助基础之上,但除了最后一项“朋友”之外,其余纲常都排斥了自主性和平等原则,因此它们都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中自我解放的对象。

〔1〕 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摆脱宗教迷信的运动,这一观点可参阅 Max Horkheimer 与 Theodor Adorno 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1972)。

〔2〕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建者,他提出一种世界观,遭致启蒙知识分子的反对。他第一个赋予“礼”以宗教涵义。按照《论语》的说法,“忠”是贯彻“礼”,驯化人类情感,改良社会的唯一最佳方式。要实施“礼”只要遵循“道”即可。所谓“道”,按照 Herbert Fingarette 的说法,就是“不需选择之路”。参阅 Herbert Fingarette:《孔子:俗世的圣人》(*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1972), pp. 18 & 21。

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叛者对中国社会中的惰性和精神麻木展开了猛烈的攻讦,其激烈程度,与18世纪对被伏尔泰称为“宗教狂热”(the delirium of religion)的攻讦不相上下。^[1]但是,远不同于欧洲的先辈,中国启蒙运动倡导者并不满足于眼前科学真理战胜盲目迷信的成果。因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不是对超凡上帝的信仰,而是人们对宗法权威(皇帝、父亲、党魁)的盲从;因此,他们必须预备与其同胞的社会政治内在推力,作一持久性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推动力早已经与被视为中国文明之精神优越性的泉源——儒家价值,融为一体了。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们由于对此精神文明优越性提出挑战,因而被视为危险人物,其境遇一如反叛超凡上帝观的欧洲哲学家们。

欧洲启蒙的中国赞颂者们,也同样被冠上“破坏性”与“危险”的罪名。在当时民族革命的环境中,这些人还有另一项罪名:“非中国化”(un-Chinese)。因此,中国启蒙先驱者要想坚持批判本国文化,其难度要比欧洲人大得多。欧洲先哲不用受到诸如“非法国化”、“非英国化”或“非德国化”之类的指责。那时大家都是相信世界性的“启蒙运动”(Aufklärer)团体的成员,相互间的关系已超越了政治和民族的界线。但是,欧洲先哲在20世纪中国的精神传人,正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国家”问题至高无上。身为内忧外患连绵不断的中国公民,鼓吹启蒙将不断要遭受攻击。即使在今天,他们仍必须在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指导”下,去发掘并应用其批判理性。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探求

如同150年前的欧洲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理性批判的发

[1] 虽然伏尔泰猛烈批评同代人的宗教狂热,但他却又极力赞扬“中国文人的宗教”。参阅 Peter Gay 编辑的《启蒙:诗文选编》(*The Enlightenment: 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New York, 1973), pp. 241—242。

现预示着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变。但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这种转变却不明确,也不如启蒙者当初想象的那样顺利。〔1〕陈腐过时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余毒,还残留在自以为现代化了的人们的内心,这一现象震撼了那些试图用客观怀疑来取代迷信和偏见的人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惊骇反复不断地再现。目睹和经历多次政治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比欧洲先哲们更有理由惧怕旧思想心态的复活。

在努力使中国能够走上真正现代化的道路的同时,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吸收和转换能力。因而他们对民族心性的批判必须变换角度,方能对同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继续提出质疑。所以,他们求助于西方(更明确地说,他们大多读到的是经由日文转译的西方书籍和思想)。中国的激进分子愈是崇信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他们就愈被指责为企图输入西方现代化思想,以改造无与伦比的中国文明。那些敢于冒险犯难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历史本身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显现这一事实,)封建主义(feudalism)在一个自称现代化至革命的社会中,仍然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

从中国历史上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先于启蒙问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尊奉儒教的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探索强盛国家、壮大国威和抵御外来侵略的道路。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张之洞,在1880年代曾诉诸爱国的革命志士们,以提出一个使中国得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救国良方。他的主张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这种“体用说”在实践上却是相当复杂。政治改革家发现,被嵌进入西方之“用”——专业技术——的深具特色的“体”,是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相对立;更

〔1〕 参阅 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Daedalus* (Spring 1972)。

确切地说,与儒家思想相对立的。〔1〕这种体用不可分离说,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者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因为它同时为文化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使他们能够利用从外国学来的理性批判,重新评价民族传统,从而复兴和强盛国家。

20世纪初,怀疑张之洞“体用说”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出现了。在漫游日本和欧洲之后,这些儒家学者开始对“国学”的优越性,特别是那些被帝国科举制度所推崇的封建思想要素,公然提出怀疑。这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被中国第一次民族主义革命——反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的浪潮所打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一章内详述。为了致力于改革儒家教育,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结束了对所谓的“异族”的清政府的斗争,此前,他们曾将这个政府视为救国和复兴的首要障碍。他们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要想“救国”,首要的是“救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救国”首先有赖于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文主义。而贯彻落实这一深刻见解的任务,则落到了后来几代人的身上。〔2〕

这种文化至上论(primacy of culture)可溯源至1911年政治革命的失败。一旦人们反对封建王朝的乐观热情衰退,陈腐的旧文化价值观就明显地呈现出其顽强性。一群从前的革命者开始致力于探求新的世界观,这种探求要比从前的儒家改革者所作的更为彻底。这些知识分子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他们试图阐明传统思维复炽的现象,特别是当北京已没有在位的天子,而民众还存在着皇帝崇拜的心理现象。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急需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关于这点,我们

〔1〕 对19世纪中国的“体用分离说”的批判可参阅 Joseph Levenson:《儒教中国与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1968) vol. 1。

〔2〕 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五四”作品中清楚看到“救国”与“救人”同等重要的思想。这个说法首先是被张岱年等人研究出来的。见张岱年、刘玉林合著:《“五四”时期批判封建旧道德历史意义》,《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北京,1980)第1卷,pp.507—523。

将在第二及第三章讨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深刻分析广泛存在着的奴性 (self-submission) 倾向, 并予以揭露。按照他们的观点, 辛亥革命为国家的自主、个人的自立开启了希望之路, 可是, 由于奴性倾向的存在, 他们的同胞并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聚集在“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之下, 希望从奴性理论观 (ethic of subservience) 中解放出来。他们指望后继者能实现他们的愿望, 期许这批“新青年”们能够证实: 只有先保障具有批判思维能力之公民的人权, 一个真正现代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才有实现的可能。

这样, 历史活动舞台上出现了一代新人——“五四”人。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是 1919 年汇集在北京大学 (北大) 的学生。他们以实现其师辈反传统的模糊希望为己任。他们的年龄和进入北大之前所受的教育, 使他们较少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 从而也就不那么憎恨它。他们不像其师辈那样自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便备受封建心态的困扰, 因此在进行文化批判时更为理性。他们对政治活动也不那么悲观, 所以他们迅速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所爆发的政治危机作出反应。

这代人的聚合点是 1919 年 5 月 4 日所发生的事件, 这次事件开始时只是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示威游行, 而在其后几年, 则发展为全国性的文化和政治觉醒运动。这场日益扩大的运动除了涉及文学和家庭的改革, 还包括了能吸引众多民众以倾诉其激进观点的教育精英。透过街头演讲以宣传主张, 这群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验其先师辈的思想。从第一次面对有待唤醒的群众时, 他们对自己和理性批判就充满了信心。借助理性批判这一武器, 他们试图唤醒那些尚未启蒙的同代人。学生运动的一位领袖、新潮社的创始人之一罗家伦, 在“五四”事件一年后撰文颂扬“五四运动”时便认为, “五四运动”已经使中国从长期落后中觉醒过来。

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 口里法螺破天, 笔下天花乱坠……唯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 奋空拳、扬白手, 和黑暗

势力相奋斗……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

“五四运动”的功劳就是使中国“动”！〔1〕

“使中国‘动’”这一颇富戏剧性的主张，成为“五四运动”神话的精髓。它显示了与过去无可避免的彻底决裂。本书同时主张，在这个神话的背后，还有着更平凡却更深远的意义。“五四运动”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和光明的启蒙之路，但它的意义远不止此；它还标志着在进行民族主义革命的同时，人们开始不断地努力根除封建主义。这次，知识分子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并一直战斗到现在。他们受过现代科学的教育，相对地能较不受“黑暗势力”的影响，所以能为“奄奄一息的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一如我们所将了解的，他们系站在一个极其优越的立场，以摆脱“体用论”的束缚。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强使西方的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屈从于中国的精神文明。他们有能力同时也有志于从事文化相对论，这使他们同缺乏教育的民众和死守“国粹”的儒家学者截然不同。因此，当他们宣称“推动”了中国，或至少使中国“动”了的时候，他们再次肯定的，绝不仅是建立在“中体西用”基础上的救国运动，而是超乎其上的其他东西。

夸张的声调、自傲地将自己想象为反对黑暗势力的徒手勇士、简单化的反传统思想，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访问中国的西方人眼中的“五四”知识分子，而在这点上，他们倒是很像欧洲启蒙运动后期的哲学家们。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杜威（John Dewey）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们论及中国的文章中都谈到，中国人追求新文化的狂热，似乎就是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启蒙运动的翻版。罗素和德日进以矛盾的心情记述了他们在1920年代中国的所见所闻：急切地力图实现欧

〔1〕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May 1920），p. 607。